

583

128.7
F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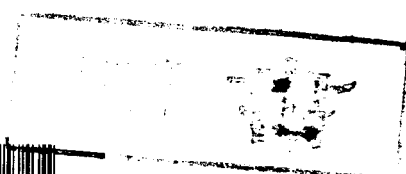
青春寻梦

——广东打工潮追击

本社文艺部 编



A0830531



校内特区研究中心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来自女儿国的报告

南下深圳的女工潮

一个幽灵在西太平洋上空游弋。

最先把这个讯息告诉深圳人的，是他们的日本朋友大来佐武男。

1984年，中日经济信息交流会在深圳举行，中国经济界南北精英荟萃，而日本与会者，除了能源政策论坛议长向坂正男，兴业银行调查部长小林实等一批蜚声国际经济界的名家外，还有一位极受国际经坛尊崇的日本前外相，现全日本政策研究会长大来佐武男。

其时，深圳雅园宾馆富丽豪华的大厅内灯火辉煌，大来佐武男举杯来到市长身边，把一个讯息告诉他的深圳朋友：“深圳起飞的时代即将到来。自今算起，大约3至5年后，将有总数约为4000~5000亿美元的游资，从欧美大陆，从日本、南朝鲜……溢出。而这笔游资最可能，也是最理想的投放地点，将是以深圳、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工业区。”

简直是神话中的阿里巴巴的宝库！

而钥匙将交到中国人手里。

深圳，不，整个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机将要来临了！

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形成世界性经济布局的转移，在

历史上已有先例：

本世纪 50、60 年代，欧美一些国家把原由本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大量进口，而向劳力低廉、技术不发达的日本和台湾、南朝鲜等大量输出资金、技术和设备。

经济循环，周而复始。日元升值，出口受阻，亚洲“四小龙”近年又出现了当年欧美的情状。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了！

深圳人，在悄悄地进行着一系列大潮来临前的准备：一个创建投资环境的计划在紧张进行，到 1987 年为止，深圳完成基建投资数 10 亿元，竣工城市道路 208 公里，兴建赤湾港口，营建国际机场，矗起南海酒店、国贸大厦……仅宝安县 1 年之中便从国家银行贷款建成厂房 180 万平方米。而世界闻名的南朝鲜马山加工区，经营 12 年，厂房才不过 8 万平方米！

但是，它会来吗？那太平洋上的大潮！

来了！大来佐武男的预测应验了！到 1985 年夏末，太平洋上开始潮动，先是小批客商，然后是大批，从香港，从日本，从欧美各国而来。一张张恳请合作的信笺、订单纷纷飞来，成千成百的小汽车，日夜穿梭不息于横岗、龙岗、布吉的公路，一位位衣冠楚楚、黄发碧眼的大贾走下车来，拜会刚从农田中拔出泥脚来的镇长、村长、村民！

3 年功夫，沿着从深圳到广州，深圳到惠阳的两条大动脉所展开的几百公里扇面上，冒出了几千家高擎着日本“三洋”、美国“百事可乐”、香港“信达”……等等招牌的电子、饮食、玩具、塑料等来料加工厂。到 1987 年，深圳的工业总产值比 8 年前暴涨了 100 倍，一个实际上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加工基地，已经在珠江口崛起！

随着南太平洋上振荡波的登陆，另一股浪潮又自北边中国广袤大地向珠江口席卷而来，这是发生于80年代初由几十万18—22岁少女组成的女工南下大潮。

在汕头、梅县，在湖南、新疆……多少女孩子被报上招工的启事所激动，为特区纷纭驳杂的光色所诱惑，附耳传递着“深圳”这个新奇、神秘名词；一个个少女从农村低矮的房屋中，从枝桠交错的桑林中，从小镇斜歪的石板街中走出来了。她们或提一个包袱，或夹一卷行李，饮泪告别家园，回首辞却父母，踏上了人生旅途的第一程。

于是，深圳涨潮了。深圳的街头，车站，高墙的大红招工榜下，你随处可见一群群皮肤黝黑，窄衣紧裤、短发齐颈、操着各种不同口音的“闯深圳”的少女。

据最保守的估计，在深圳做工的女临工，人数已超过28万！

有一个最简单的数字可以说明女工在深圳、尤其是深圳周围的镇区“泛滥”的程度：横岗镇，原有居民仅9000多人，而外来女工人数却达1.5万人。这是一个当地人被外来人“淹没”的世界，男人们被少女们淹没的世界！

然而，这如潮如涌南下而来的少女，都有一个特点，她们受雇于外国的、中国的、尤其是港澳的厂主，干一天活，拿一天的钱；今天在这个厂做玩具，明天就可能到那个厂织衣；今天这个厂主请她，明天就可能被辞掉，几乎不经过任何手续。

当你步入深圳北面那几千家加工厂群落时，一个明显的印象是：这是一片“女儿国”——加工企业的性质决定的它的工人性别，从以下一个较为保守的男女比例数便可见一斑：

蛇口工业区：1：3

龙岗工业区：1：5

布吉工业区：1：7

在许多工厂中，不仅工人是女的，技术人员是女的，厂长经理是女的，连保卫人员也是女的。为了“安全”起见，有些厂甚至不收任何一个男人，成了地地道道的“女儿国”。

由于女性过度的集中，春怨、插足、甚至卖淫，以及由于性导向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在这 20 多万女临时工中——深圳人给予的最合适的称呼——便时有发生。

我记得当男士们经过那正在制衣或者装配录音机的上千名女工的身边时，从座位上投过来的焦渴的目光。

我记得那位把收集的报刊上的征婚男性的名字剪下来，然后用剪刀一点点剪成碎片的姑娘。

我记得每当夜幕降临时，在深圳××桥边坐着的一群群女工，嘻笑着指着过往的男士，用最地道的家乡土语互谑：“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

深圳一位心理专家说：“谁也阻止不了她去想性问题，她们心中像堆着干柴，若遇情爱之火，很快就会熊熊燃烧。”

她们是深圳财富的创造者，她们为深圳带来了繁荣。但她们在这赖以生存的环境中有多少欢乐、苦恼，展露过多少笑颜，流下了多少泪水，能有几人了解呢？

女儿国的呼吸声

1987 年除夕夜晚，有人向××派出所报告说，寄住在深圳市福田村××号的一些电子厂女工，正在聚众赌博。

在深南中路的西北面，有一大片鳞次栉比的厂房，高擎着醒目的红黄字号：“华强三洋”、“科导”、“深达”……这片工

业区有女工大约 6200 人，一般来说，工厂不予解决住房。从外地来深做工的女孩子，于是需忍痛每月出 10~30 元不等的租金，在福田村一带农民家中租房居住。

时值年关，一些女工因故不能回家，聚集在一起，赌博是很有可能。

接到报告的 4 名民警立即出动，接近了一幢破旧的平房。民警破门而入，但最后查到的唯一赌证是 5 个扔在床上的纸团，上面写着：“炒鱿鱼”、“赚大把钱”、“睡个饱觉”、“找到靓仔”和“上当受骗”。

这儿是蛇口四海宿舍区。它聚居着总数在 7000 以上的女性工人，也许是当今全国乃至全世界单身女性最集中的地方了。

某报有一段报道她们生活的文字：

“假如你能在任何一天的清晨 6 点，走进四海的任何一幢宿舍，你会看到，8 张铁架床，密密麻麻躺着以各种姿式睡着的 8 个打工妹。俄尔，其中一个翻了个身：‘起床罢——上工了。’没人理。虽然大家都醒了，却都睁大眼，望着天花板出神。于是又有人喊：‘要打卡哟——’一想到那六亲不认的打卡机，打卡迟到要罚钱，忽然一下，8 个人全都下床，手脚快的先抢了宿舍唯一的洗脸池，动作慢的一脚跨进厕所，把牙缸伸向只有 1.8 尺高的龙头……半小时后，最后一口早点还在口中，人却已在机器边操作了……”

9 年来，蛇口工业区经济效益持续上升，楼房越盖越漂亮……这与打工仔长年累月的加班，按时打卡，是不是有关系呢？

“我真困，我最大的愿望是明早不要叫醒我，让我睡到

中午、下午、一整天……”一位小姑娘美滋滋地想着。

“上厕所都不能呆得太久。”谈起劳动的紧张程度，一位正站在街口，手端盒饭往口中扒的电子厂女工对我说——她们大多这样，逢上加班紧时，中途吃饭限半小时，于是，摸到门径的小贩常在此时把盒饭车推到厂前，以两倍于平常的价钱出售给她们。

“老板接不到订单就辞退我们，订单一接得多就逼我们加班，我们每天工作 10 几小时，甚至 20 个小时，有时真想在座位上闭 5 秒钟眼，但流水线上的产品马上传过来了……”

深圳、蛇口许多电子厂的环境都不错，门外是绿草坪、蓝天、大海，但是，有多少人无暇去走一走？

一位参加深大夜大学学习的女工向工会干部说：“面对旷工和旷课，为了生活，为了眼前的利益，我只得选择旷课。”

“不可以不加班吗？”“不行的——”一位女工说，“除非你不想干了，老板只要钱，谁管你累不累？”

“但是加班有加班费啊，据说你们最多的每月拿到 400 元。”“是的，如果每月 30 天都加班的话。”她说，“加少量班。可以，加多了，谁愿为钱拼命？对不起，我要睡了——”她竟然毫不礼貌地下“逐客令”，然后侧身瘫倒在床上……

“我怕加班，更怕下班——”一位女工说，“业余的几小时最难度过。”

我环顾四下，——这是在福田区一间约 4 平方米的房子，上铺迭下铺，密密麻麻竟搭了 6 张床，连张桌子都放不下：“你看，我给家里写封信，都要坐在床上，把块木板垫在腿上才成。”

“厂里只管叫我们做工，我们住得离厂又远，业余时间几乎没人管。”

“业余时间为什么不去游乐场所活跃一下生活呢？”

“上游乐场、舞厅，好贵呀，谁出得起？”她说：“不过，我还是想到三洋厂去借书，或者打球的，但上别人厂玩，总觉得不好意思，上马路蹓跶又怕遇上男人……这样，一下班，我就只好对着这床铺、被褥，还有小灶用的炊具了。”

在蛇口，有人作过考察，蛇口的夜晚，那大约1万名女工，去了哪里呢？

下午5时左右，蛇口下班、倒班的人流开始从各条马路涌向通往四海宿舍的大道。单车的后架上，或夹着几支大葱，或夹着一把青菜，大道上出现了景象壮观、数以千计的单车流——据说，蛇口许多工厂都给进厂的工人发一部单车，以后分期扣款。

大约一小时后，大道上的单车流消失了，化整为零，进入宿舍的各个格子间，有的用汤匙敲着搪瓷盆，急急下楼去食堂排队买饭；有的把门掩上，偷偷插上电炉，以剪刀当菜刀，剪着一小束青菜，一小段腊肠……搪瓷盆在电炉上“吱吱”冒着油泡，“凯达姐”和“三洋妹”们，各自把汤匙伸向搪瓷盆，分享着“公用晚餐”。

“往下的时间——大约从7点开始吧，就谁也不知道谁干什么了。”

据了解，此时，5%的女工们仍在宿舍紧张地排队，等用冲凉房；刷鞋；把脸盆端到阳台上，搓着衣服，与楼下被污水滴到头上的女工对骂。

1%的人已经干完了“清理自己”的工作，或者把“清理”工作留到别人之后，先到各种学习班、讲座中去听课，千方

百计跻身更高的层次。

5%的人到仅有的两个俱乐部里看图书，打乒乓球。花1元钱进舞厅，希望在昏暗的红绿灯照映下，寻找业余时间的刺激。

另有1%的女工穿上自认为最时髦的衣服、描上眉，在宿舍周围、商店周围兜圈子，一遍又一遍，一回又一回……不买东西，也不知为什么。终于烦了，于是手拉手倒在草地上，数天上的星星，从1数到1000……看过路的人：骑单车的，步行的各有多少。有人说了句毫不好笑的笑话，于是众人拼命地大笑……

对于不了解深圳内情的人来说，一定以为这儿是块竞争的最理想的土地，强悍者，必能够出人头地，其实，并不尽然。

对于闯深圳的这批女孩子，她们在深圳的命运如何，一般都取决于她们的运气。即：取决于她们提着包袱，站在哪家工厂的门口。

她运气不错。

“业余时间吗？”一位正在打羽毛球的姑娘停止了运动，“我们打球，上厂俱乐部，跳舞，厂里还办了美容学习班，我们的业余生活，得向高层次前进啦……”这是在深圳市的华强三洋厂——一个日本人同广东省合办的工厂的宿舍区，这厂的班底是从粤北迁来的，还保持着一套较完整的对工人的福利管理办法。四周绿树丛丛，宿舍排排，俱乐部、商店、球场……都安排在一个大院内，生活环境舒适，业余生活也安排得很有条理。

“临时工也能同正式工享受一样的待遇吗？”

“当然，厂里基本上怎样对待正式工，也怎样对待我们

临时工，三八节她们每人发一个保温杯，我们临时工也发一个，厂里还搞技术定期培训，临时工、合同工都要参加。”

“你们愿意去学吗？”

“愿意，不去不行，在我们这里，技术考核跟不上，就有被‘炒鱿鱼’的危险。”

去年，在全国举行的质量管理统一测验中，华强三洋厂的工人在深圳名列前茅。

深圳东联电子厂的一位女工不幸害上肺病，怕被知道后遭辞退，悄悄躲回老家。厂领导把工人一一找来询问，查明原因后急忙派专车把女工接回深圳来治疗，一切费用全由工厂负担。

这位叫翟日群的女工，含着泪在给工厂的感谢信中写道：“我想到领导来回 20 多公里看望我，我就想，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离开东联厂。”

“我真幸运，我进了柏丽工艺厂。”一位 18 岁从韶关来的女工说。这是一家由一位新加坡来的企业家开办的工厂，经理林干成，原是一位马来共产党员。他足迹踏遍欧亚美洲，谙悉西方最新的管理理论。

一位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一位资本家，得到剩余价值，这两者是怎样集合于一身的呢？

“我在以我的经历作一个试验。列宁告诉我们，工人和资本家是对立的，我却在试图尽可能使两个对立者共存于一体——也许，我会是失败者，但我却是个尝梨者。”——他用了中国的一个比喻作了结尾。

柏丽工艺厂老板林干成总是尽可能地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他们的福利，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当其他老板在生产旺

季，订单纷沓而至拼命叫工人加班时，他却在下班后同工人下象棋。女工们的宿舍里干净、整洁，每周都有卫生评比检查，检查结果输入电脑，作为年终颁发奖金的条件记录在案。

一次，林干成在巡视厂中的流水线时，发现一位女工有些走神，他连忙让她停下手，把她叫到一边：“你叫吴小英吧，你有半年多没有回家了，对吗？”吴小英对经理如此了解甚感吃惊，“我想把你妈妈接来厂里小住一个星期，食宿路费全由厂里负担，你能给我你妈妈现在的住址吗？”

一个星期后，吴小英的母亲来了，看见站在厂门口迎接的林老板，这位农村妇女感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她们真好命——”××厂的女工王丽英却说，“同我们比，真是天上地下。”

这个仅70多人的小厂，厂长是1974年偷渡到香港的两兄弟，在香港摆书摊赚了10几万，于1986年衣锦还乡，投资办厂，请了20桌客，特别请了当年追捕过他们的治安主任。

“你们每月工资多少？”“35元——”不可想象！“他们生意好时，或者高兴时，就多给发点。一切都是随意的。”“这么低的工资，会有人干？”“你看我们厂门口这条大路，每天来来往往，有多少提着包袱的湖南妹，江西妹？今天有人走，明天就会有人来。”

“我们这是彻底的厂长负责制，嘿嘿——”厂长香港人钟××对我说，“——你们不是也在搞负责制吗？做得好的，奖励，我让她当班长、管理员，每月300元，竞争失败的，我辞掉她们——”

“缺德鬼——”一个从这个厂转到石岩手袋厂做工的姑娘

诅咒道——我听说她是因为长得美貌才被“炒”走的。“他弟弟简直就是个色魔，进厂招工，得看长得漂亮不漂亮，由他定工资，40元，100元，300元……谁听话，谁陪他游水，逛深圳，就提准当班长——真缺德，还搞了一次班长招聘考试呢，其中有一项是穿泳装，看身材——”“真有这样的事？”我很惊讶。“——反正全厂就他们两个男的？他们想怎么弄便怎么弄。他说他的厂要扩大，管理人员要接待外宾，没有好的长相不行——你说他不合法？”

“你是怎么被‘炒’的呢？”我终于问起了这个问题。她露出不很高兴的神情。“别问了，反正，很简单——”

1988年8月27日上午9时，深圳去广州的列车。

6个衣服破旧的女孩子，偷偷从布吉车站爬上了北去的火车。

这是6个从布吉××厂爬墙逃出的女工，她们分别来自湖南郴州地区的嘉禾、蓝山两县。

一个月前，有人以“深圳××合资厂，高薪聘请，食宿一流”的许诺，在湘南农村那破旧的泥屋场中游说，招收女工。

42名无知的农村少女来到了深圳布吉。

“进了那个厂，就像进了监狱——”几个女孩向列车上的人哭诉，“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上班，大门一关，就没有了自由，上厕所都要工头点头。一天只给我们吃两顿饭，菜是萝卜，干白菜，谁做错了事，或谁生了病，就罚不让吃饭。有的人饿得不行，就偷偷上伙房偷菜吃。”

“我们之中有十几个人写信回家，要家里寄钱来，但是一个人也没收到信，更没收到钱，因为全要先交到厂部手

里。”

“我们再也不愿干了，我们要回去，但是厂里不让走，还威胁说，走一个，全部人都不给饭吃。”

“我们是再也无法忍受了，大家在宿舍中商量，把身上的钱都凑齐了，交给我们6个人，让我们回湖南老家报信，好来人接我们回去。”

“我们6个人是昨晚在工友们的掩护下爬墙逃出来的，大叔阿姨你们行行好吧，列车员来了你们别做声，让我们回去，我们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你们——”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会有这等事！”整个车厢的旅客都惊讶了！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反正，它是出现了。

在一幢幢厂楼崛起；在成亿美元的工缴费由海外汇入深圳；在一批批的女工成为厂长、技术员、管理员的背后，有着一块又一块这般的阴影！

这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同日、美、港澳……合资的工厂中，中国女工所遇到的现实！

女儿国“国王”

在这复杂、艰险、喜忧参半的环境中，她却“站”起来了，排开种种干扰，骄傲地站起来。从一个农家娃变成了“女儿国国王”，跻身于企业家的行列。

改革的大潮造就了她！

两个女孩提着行李，站在深圳国贸大厦前面，显然愣住了。摩天大厦，直插云端，到处车水马龙，红绿霓虹灯招牌

叫人眼花缭乱……

这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喧嚣、嘈杂，全然不同于那个河里飘着帆船的宁静的小镇。

陌生，可以使人惶惑，甚至恐惧。

“我……好怕，我们，还是……回去吧。”其中一个瘦小点的叶丽英小声咕哝说。

“回去？我不回。”另一个皮肤有些黧黑，面目中显出一股英气的高个姑娘说：“来了就不回！”她用鄙夷的眼光看着满街的人流，看着那些穿着阔绰、高挺着胸脯从她们身边神气走过的“太太”、“小姐”：“她们能在这里生活，为什么我不能？”

她，就是几年后深圳鼎鼎有名的女厂长赵露珍，似乎命运早已决定了，有一天，她要被推上“女儿国国王”的宝座。

“收下我们吧，我们什么都会干。”10个小时之后，两个女孩站在布吉镇一位砖厂老板面前：“干不好，你打发我们走好了，3天也行，1个月也行，一辈子跟你也行！”

老板把她们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短发、长衣裤、凉鞋，皮肤黧黑，身体结实——显然是干过不少活的农村姑娘——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工资，每天3元；住房，自己找，什么时候加班，加多久，由我定，愿意干，就在这上头按手印。”

老板抽出嘴里的烟，把一张写满字的纸递到她俩面前。

第一夜，她们宿在一片破旧的板棚里。

这地方距离闹市中心好几十里地，全厂四五十人，白天打砖，夕阳西下时，老板站在棚栏边，往每个汗流浹的打工仔的手心上放3张红色小票——这就是工厂与工人的关系。至于晚上你在哪儿吃饭，睡在哪儿，有没有毒蛇来光顾板

棚，一概是你自己的事。

“赵露珍——”门外有人在叫。来人是砖厂的管工吴八。吴八将赵露珍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你倒好运——明天不要打砖了，老板叫你当采买，买菜——住厂楼了！”

赵露珍愣了一下，“那丽英呢？”她指着板棚中探出的脑袋。

吴八：“包你一人还包你七老八十代？”

“我不去——”赵露珍一扭头，“我们一起来的。”

吴八吞了几口口水，他还未见过这么死心眼的女仔：“我叫你打砖就得打砖，我让你买菜就得买菜，这是什么地方，知道吗？深圳，香港人的厂子。”

“要是我不干呢？”

“不干？”像是石头碰出了火，“你就给我滚——”

赵露珍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炒鱿鱼”。

两天后，在深圳通往广州的公路边，有一片不大的玩具织衣厂，两个夹着行李的女仔站在厂门口的一张启事牌前，牌上写着：“招收熟练女车工。”

谁知她发达的起点，就从这儿开始。

她在织衣厂仅干了3个月就被一双慧眼盯住了。

三八妇女节，玩具织衣厂召开颁奖大会，照例有上级领导主持颁奖，镇里派来玩具织衣厂的是镇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后来的布吉镇长欧官成。

“包装车间——”厂长公布受奖名字，台下数百女工一片掌声，然而，台下无人上台领奖。“包装车间上台领奖——”欧官成手拿奖旗和一迭奖金，显得有些尴尬。厂长生气了：“赵露珍上台领奖——”那时，由于车间主任不在，她被派作

代理车间负责人。

“她——没有来。”台下5个包装车间年小的女工怯怯地说：“她正领着全车间加班，叫我们当代表。”

“乱弹琴——”厂长大骂了起来。

欧官成却笑了。

两个月以后厂里举行拔河比赛：“包装车间”对“后勤”。

后勤组的早已手抓粗绳，严阵以待，包装车间出场的十几个姑娘却忸忸怩怩，吃吃笑着，你推我推，不敢上阵。

厂长十分抱歉，对着来观赛的总经理欧官成摊摊手：“没办法，又是那个赵露珍没来。她们就是泥巴人啦——”厂长又对十几个姑娘嚷起来，“没有赵露珍就不会动啦！”

姑娘们益发吃吃笑了，你推我推。

“赵露珍来了——”“赵露珍！”包装车间的女工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一个高挑个儿，面目俊秀，轮廓分明的姑娘擦着手，朝赛场跑来了。

奇怪，十几个姑娘“唰”地一齐拿起了绳，赵露珍上前站了第一个位。

“一、二、三……”厂长挥动了红旗。

包装车间赢了。厂长笑了，把别人递给他的一盒菊花茶递给赵露珍，赵露珍却把它递给了爬绳尾的姐妹，自己用搪瓷缸，从茶桶里勺了一缸茶水。

这一切，都落在思才若渴的欧官成眼中。

半年多来，布吉镇的来料加工厂如雨后春笋，猛增了一二百家，欧官成把手下原只会赶牛耕田的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长、会计、民兵排长……全都推上了阵。来往不绝的港商、

美商、日商……一封封要求加派领导骨干的报告，随着一张张合资办厂合同雪片似地飞到他案上来告急。

这是个需才如渴的时刻！时势造英雄！

“如果叫你当厂长，你干不干？”

“厂长？”听见县团委书记纪志龙的话，赵露珍愣了——显然团委在培养自己。

“管 1200 人，每月工资 700 元，调你到布吉织造厂去。”

“1200 人——”有点吓人！她记起高小毕业时，班上曾推她去 1000 人的大会上发言，当她一看到那黑麻麻的一片人头，心都紧张得要跳出来了，而今天，是叫自己去管理 1200 人，当她们的头儿！

“当就当！”谁知她响当地蹦出了这么一句。

——正如她闯深圳一样，她要试一试“闯厂长”又是个什么味。

谁知她一发不可收了。

“女儿国王”赵露珍第一天上班便觉察到为什么要调她来的原因了：8：00 上班，大部分女工要 8：30 才懒洋洋拖着鞋进厂。上午还在工厂干着，下午就突然上深圳走亲戚去了，谁要批评她们干脆不来了，“拜拜”，上别的厂打工去了。

原因很简单，临时工，我想怎样便怎样，绝对的自由！

赵露珍每天最早来到厂门口，叫每个上班的女工进厂前，在自己的工卡上“打卡”，迟到、旷工的工人她都一一记载下来，然后按天公布在工厂门口：该罚款的罚款，该辞退的辞退！

这下惹恼了一群潮汕来的打工妹：“干么扣我的工资？”“原先的厂长谁也没这么干过！”“你要辞一个，咱们全都不干